



十年間

許多外國人從歐洲到蘇聯來觀光。他們和俄國人在一處過了兩三個星期，就回國去細述他們所見的一切。他們好像是具有非常深徹的智慧的人，所以他們只花二三天工夫，就可以充分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進展，而這一個國家却擁了一萬六千萬的人民。關於它的過去，這些外國人知道得很少，對於它的現在，他們更懷着敵對的情緒。歷史本已養成人類的一種能力，使在幹着極大的事情，以及覺察極大的事情時，感到較大的興趣和快樂，所以我們的來賓們之必需覺察蘇聯政府的事務，以及「錯誤」和「短處」，以及俄國人「沒有文化的」情況和他們一般的類乎鬼魔的凶惡，乃是相當然的事情。

還有一件東西，也影響對於俄羅斯的判斷，那就是歐洲人的多年的痼疾，以為自己比俄羅斯人優越得多。而對於自己的優越，變成誇張到不合理以及吹噓得可笑的意識。這種痼疾是由於他

們太過忽略關於俄羅斯人的每一層事。並且，很自然地，還有一件事也增加了歐羅巴文化的代表們對俄羅斯，特別是現代的俄羅斯的完全誤解；要點是，伯羅德，倫敦諸先生和他們的一類人物都是聽從派遣他們的那些人的意志的，雖然我敢說他們之中，總有幾個在這樣幹的時候，損傷了他們個人的意願。

爲了所有這些緣故，考察俄羅斯生活的人們，在敘述他們並不過於可惡的軼事時，或者由於故意，或者由於無知或失檢，但是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他們的階級心理的結果，所以他們很易於忘却蘇維埃政府所處的困難與複雜的環境，在此環境中，蘇聯政府既要恢復歐戰與內戰所摧毀的經濟生活，又要進行創造一個新的文化。至於干涉者在奴隸和危害俄羅斯時所幹的活躍的工作，這些考察者是完全默然不提的。前四時國人第一點說了前三點，第四點是時局問題。他們關於蘇聯只不過化去十年間的六個年頭來幹這創造的工作這一事實，也不提起。其它的四年給內戰佔據了，這場戰事固然使國家蒙到更大的損失，但是同時却有助於人民的清醒鎮定，驅除了多方面的幻想而給與他們一個新的心理。

這場內戰也許會延長到今日，倘若沒有列甯和他的同志們冒着完全毀滅了布爾希維克的危險，把布爾希維克黨消納到那些由於戰事而變做無政府主義者的農民羣中，使前者成爲後者的領導

• 列甯這樣做，才救了俄羅斯，不使它粉碎與奴化在歐洲資本家的手裏——而歷史也決不能不歸功於列甯。

多誰都知道俄羅斯的布爾喬亞竭力要把這個國家交給英國和法國：直到今天，這一階級也還沒失掉那引起一次外人入侵俄國的希望。

布爾希維克黨獲得政權後所承繼的遺產是什麼？在過去六七年裏，它不斷工作所憑的條件是什麼？幾百萬最康健最有體力的俄國人民已在戰爭中消滅了。一大部份的「革命的」知識階級投到民衆的敵人方面去了。還有一部份罷工，拒絕幫助新政權來爲着勞動大衆的解放而戰鬥，於是向自專制政治的敵人們變成他們自己的民衆的「內部的敵人」。國家的農業，本在崩潰的狀態中，又在「白色」軍隊的攻擊中繼續敗壞。工廠的設備，本來就不好，在內戰中，全部的機器都給消毀了，而且這內戰還毀滅了一大羣受過政治與文化啓蒙的工人。代替這樣的工人，內戰賜給蘇維埃一個已經粉碎了的制度的餘孽，使那些像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所大量生產出來的沒落的人，重又活動起來。這些人自然有計劃地或自動地找尋路線，伸入蘇維埃組織；並且直到今天，我們知道，政府還不能完全肅清他們，新近雷耶尚士匪的暴行就證明了這一點。歐洲若干政府一向就努力阻礙蘇維埃政府改組國家的經濟和文化的工作，同時俄羅斯的亡命者得到歐洲布爾喬亞層的供

給，也不斷對於他們自己的同胞作游擊式的進攻，訓練奸細，僱用刺客，派他們到俄國去。除此以外，還要加上『饑荒』的一年。

這是一個簡單的，當然也不完全的敘述，說明蘇維埃政府開始以及還在繼續工作時所處的環境。任何一個人都會想像到，凡要描寫今日的俄羅斯的，不該忽視了這許多事實。那時，在這六年間，蘇維埃政府已經成就了什麼？第一、俄羅斯的工人和農民們正在學習如何治理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開始覺得國家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並且他們也覺得，唯有國中所有的力量，對於他們如此英勇地且發來完成的工作，意識到它的富貴和艱難，因而融洽地合作着，才能實現他們所希求的自由。世界上的勞作的人，是越來越能認識這一事實的意義了，雖則很慢。

歐洲的知識份子大多數對於他們自己人民的命運毫不關心，假若他們得到較為正確的報告，關於在俄羅斯所已建樹的一切，他們也許覺得那是太可羨慕了。在蘇維埃聯邦裏，對人類社會如此重要的科學家的工作，是被充分珍視的，俄羅斯科學家們自己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他們在這十年中，已能展開了驚人的事業。他們有他們的『科學家的房子』和他們自己的休息所，這些設置在歐洲是找不到的。俄羅斯的科學家是政府的活潑而有力的合作者，關於許多科學家所受的尊敬

便可知道。政府對當時還很困難的經濟情況之所許，來仔細考量到他們的幸福和需要。在大戰後的歐洲，原來製作維持和供給科學機關的基金，被削減很多；反之，在俄羅斯，許多研究機關設立了，許多新的大學也創辦了；關於國家鑛產的研究被放在一個大規模的基礎上，許多種類的新鑛苗也被發現了；若干價值很高的科學的發現和技術的發明也造成了；撲滅殘物蟲和消除其它農業上的災害的新方法，已在應用了；沼澤吸乾，牛的繁殖改良，還有其它。國家的電氣事業前進得很穩健，新的工廠在建造，新的生產事業慢慢的在發展。

一個非常獨特的報紙創辦出來了，專為工人和農民的福利，瑣碎到他們日常生活的細節和需要，也都留意。還有許多小型報紙，是工人在他們的工廠，印刷所，電車廠上所發行的，和許多城市裏所辦的巨型報紙幾乎具有相等的文化和政治價值。在這些小報裏，工人們自己學習着關於他們每天的問題以及增加勞動生產力的方法，在這裏，工人們的自我批判，顯示出他們被提高了的自信心，他們的日益成長的文化的要求，以及他們對於知識的渴望。

在蘇維埃聯邦裏，除了許多「女代表」外，還有若干婦女，和男子一樣參與着經濟的工作，統稱「拉伯科」（工人通信員）隊，和「色圖科」（村鎮通信員）隊。這就是說，人民方受教練，而且也在很快地學習如何自由發表他們自己的需要和意見。「新娘索莫爾」（青年共黨同盟）

的人數正在增加，還有少年先鋒隊跟在他們的後面，這些孩子們也正被教練如何從一個整個國家的觀點去看一切的事情。

鄉村地帶也受到報紙，圖畫雜誌和小冊子等糧食的供給，這些東西以農村經營的所有方面爲對象，每期要印成千成萬本。此外，還有一『無線電報紙』，已經約有五百萬的聽戶。求知的飢渴散布在農民之中，這是文化成長的一個標記。婦女們年年增添她們在這國家政治生活方面所參加的工作。回教婦女方被解放。非俄籍的人們被拉到文化生活的巨流裏來，並且還在要求着他們自己的都會，去促成新城市的生長。例如甘薩恩就很快地發展成爲薩維共和國的都會了。

我們可以說農民間的識字水準還是很低。這是事實。但是學校却在散布到各處。加以每年有成萬的受過教育的紅軍人士回到村間，又有成千的工人從城市來到鄉間渡他們的假日。這些人成爲好的教師。我們也必需認識電燈的重大的文化價值；在漫漫的長夜裏，它照亮了成千農民的小屋，它的光把識字和不識字的人一齊都吸引來了，使他們聚在一處，討論世界上發生着的事情。沒有一個人能够責備我對於農民階層的理想化；但是我肯定地說，在蘇聯，有一大羣的農人，他們對於世界的熟習和文化的活躍，遠過歐洲任何其它國家的農人。

但是，一件主要的事情，而爲歐洲旅客所不會並且不會見到，就是，在蘇聯有極多數的人

正被拉入公共的生活中去，人們在很快地拋棄着千世紀的奴隸制。他們所造成心理，他們並在開始把國家看作是人民追求一個共同目的的一種組織，而非那些已被製作互相仇視的階級底個人們之無政府的和機械的團聚。

有人應該告訴我，這番話只是一種空詞。真的，這是空詞。我一生認為英雄的只是那一些人，他們在工作中感到愉快並且也能够工作，他們的目的，為着創造的工作而解放人類所有的力量，因此使得我們的世界更加美好；和組織起那些對於人類有價值的世上的許多生活的形式。

爲了實現這一目的，布爾希維克主義者們，正用驚人的力量奮鬥着。

他們並且得到成功。所有忠誠的人，只要不懷仇恨之心遮掩他們的眼睛，都覺得這一成功是確然無疑的。全世界各處的勞動的人正開始明瞭這番工作的意義，認識他們自身必須參加的部份。

十年已經過去了，然而蘇維埃制度依然存在，而且一天天地趨於穩健，它的力量的膨脹更使某些自稱為『馬薩里克』的感到深深的苦悶。

在蘇聯，的確已經安下了一個新世界的基礎。像這樣的一種基礎，我認為是那曾被禁錮的生存意志之解放；就是說，動作意志之解放，因為生命本來就是動作。人們的自由的努力，自來是

到處都被沒有知覺的大儒式的劍術所污辱和干涉。資本主義的制度向來就是摧毀創造事物的快樂；這制度把勞力從人的創造力之自由表現，轉變成它的詛咒。這一層每一個人都知道。

然而在蘇聯，大家開始知道他們的勞作對於國家有價值，對自由與文化的最短和最直接的路就在勞作中，他們是知道了這些而後才工作的。俄羅斯的工人並不像以前，要賺一筆微薄的酬金。他是賺着他自己的——一個國家。他感覺到他正在逐漸變成他的國家的主人翁，以及走向自由之路的農民階層的領袖。他也知道全世界是屬於勞動的人的；知道科學把這一世界給他，當作創造使用價值的原料，並且還控制着自然的許多力量，因而減輕了人們勞苦工作的重担。他不久就會懂得勞力不僅創造物質的價值，還有較此更大的東西，那就是，人對於理知的力量的信任，而且還深信他的使命就是用他理性所控制的意志，把意志的一切障礙物都征服。

俄羅斯的工人記得他的領袖，列寧，督促他幹的事體，並且很快地學習着如何管理他的國家——這是一件不能誇張其意義的事實。

蘇聯政府的一個大功績就是它已創辦一個報紙，使聯邦人民熟知外界的活動，以及暴露這活動所含的虛偽與卑鄙。

俄羅斯人民正不斷地為世上方在進行的每件事中硬性和彈性的處理所影響；例如統治階級的

無恥的獸性和漫無制約的意志，這些統治者們如何在沒落，失去他們的理智，以及被奴隸化的人的健康意志怎樣成長而把他們代替了。這是應當知道的最重要的事，而蘇維埃報紙正在使它被人知道。

一個人活了六十年，對於人的「壞」的品質有點厭惡，而開始經驗到，注視人的「好」品質也是需要的。這種需要並非由於疲倦；決不是的。現代俄羅斯人必須努力到如何程度，才能征服存在於他內部的「老亞當」——若干世紀的遺產，而方才所說的這種需要，就起於對此努力程度的意識或認知。資本主義制度無論在何處都不能產生一個「好人」，乃一件人盡皆知無可爭論的事實。一個三十五歲或四十五歲的俄國人現在從事於一個新生命的建設，然而我們倘若回到他從前怎樣長大的情況，我們所覺得驚異的，將不是他依然保持他的若干壞品質，而是他非但不來就沒有比從前更壞點，反而慢慢地改進。我沒有意思，要把他的壞處，估計得太低，但是我也不想向一個人要求他還不能給予的東西。

我之知道這位現代俄羅斯生活的建設者，是從他幼年時就開始。最初他是一個「被鞭笞的男孩」，可怕的俄羅斯生活的鞭子；此後他經過地面以下的革命的活動而入獄，被放逐，罰為奴隸；跟着他釀成大革命，這革命真地「撼動世界」，並且繼續撼動，直等到它崩潰。他隨又掀起一

場內戰，過了三年，勝利地結束；結束之後，他開始困難的工作，要恢復俄羅斯已經粉碎了的經濟生活，他對於這一工作，不比內戰時在前方打敗那些受過高等訓練的軍官們，簡單多一點。現在他是一位每天工作十二以至十四小時的行政者；他的生活狀況很苦，不比一個手工勞動者好多少，然而他却在完成一樁事件，這事件除了它的歷史的意義外，其特點就是它的非常的複雜性。

他從來不會有遺憾，來修養俄羅斯知識份子所曾經以及依舊自誇的那些品質，他毫不費事，就很快走進他敵人們的陣營，以表示他們底品質（如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僅為一種說法而已。他並不是一個「弄辭藻和尋求神」的人，而是這個世界的一位光榮誠實的工人，彼斷然摒棄舊的謊言，勇敢地走他自己底向自由之路（直接領到自由去的唯一的路）。

我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年這些黯淡的反動年辰之間，曾有一個時候把他叫做「造神者」，意即人在他自己的內部和在地球上面，創造了而且具體表現了一些才能，足以完成正義與美之奇蹟和別的奇蹟，而理想主義者則將此奇蹟歸諸於一種假定，是超人而存在的力量。人之勞動，傾向於使人自己深信，除理性與意志之外，更無離自然力而獨立的神奇力量，並且他必得駕馭自然力，自然力才會聽理性意志之驅策，以減輕他底勞動，安慰他底生活。他相信「只有人存在」

別的一切都是思想與行爲而已。』與他這樣一種相同的人，世人絕未見過。他自己一向就拿「自己的方法和想像」，來從事鑄造勞働羣衆的驚人事業——他現在正在完成這樁工作，成功也不在小。無論如何，他是一個豐富的創造力和才能之無可爭辯的證明，尤其證明這種豐富的創造力和才能，是隱藏在勞働羣衆之間的。

有人一定會想，他是值得一切討厭荒謬絕倫及憤世嫉俗的人的敬仰；他尤其值得從前那般「愛人者」的尊崇，愛人者們慣以激憤和趣味，去傷悼他們小兄弟底苦難。

然而從前這些「愛人者」，却把這位新生活的建樹人，當做了一切誹謗攻擊的目標。這種索然寡味的消遣資料，是由蘇維埃聯邦底印刷物所供給的，它無情地描寫和侮辱那仍舊傳染人民的舊秩序之痼疾。蘇維埃聯邦底報紙，每天刊載很多材料，促人去留意社會生活中那些鄙人醜惡的情況。那是一件光榮而必要的事。可是，這種材料，却給那些對於生活已經毫無裨益的人，提供了一種雅興。白俄記者與編輯們都惡意描寫這種「卑污醜惡」的事情，對它像瘋人般地亂咬，以為得意，跟着還大聲喊叫，把它宣傳出去。他們這類人，從生活裏找不着快樂，除非只看到生活的醜態的方面，只有如此，他們才覺得自己的純潔與天真。在反動時期，他們喜歡用這句話，「夜愈黯澹，星愈明亮」，他們所謂星，就是指他們自己。但他們是純粹爲歷史所遺棄的人，被刺

斷應該過悲慘的生涯，爲無謂的忿怒而苦惱。他們喧嚷胡說，是因爲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但歷史已向他們投去很專制的一瞥：『肅靜！』

我不打算描寫別人能够寫得更好的東西——過去十年內俄羅斯所完成的偉大的計劃。歷史

——我底愉快與驕傲，乃是關於新的俄羅斯人，新國家的建立者。

而這對這可以在全國最遙遠最偏僻的地方，在工廠，鄉村，在西比利亞大草原，在高加索山北

極陽原找到的，卑微卻也偉大的人；對這位常時孤僻，工作於人民之間，而人民依然難於了解他

的人；對這位正很得體地完成一椿看來似乎無足輕重，但其歷史意義却極大的工作的國家底公僕

——對他，我致我誠懇的祝賀。

同志，你要堅決認定，你是世上最需要的人。你做小小的事業，確已開始在開創一個新世界

了。工人！

——自己學習，還要教誨旁的人們！

——我熱烈地和你握手，同志！

——一九二七

——

——

致匿名者和僞名者

魯爾Ruhr從第尼Dni（原註一）轉載了一篇『覆高爾基』，這明明地是回答我那篇紀念十月革命十週年的文章。這篇文章的作者向我質問下面的一個問題：

『是甚麼引導你如此卑躬屈節地向我們底匪徒諂媚，而對他們的罪惡竟不發一言呢？你底話（關於蘇維埃政權下勞動對於國家底價值之理解）深深印在我們的頭腦裏，抹殺不掉了；因為正當我們高擎紅旗在手，大踏步前進以「表示」我們底熱心時，我們的妻子和母親們却排成一行，站在那裏討牛奶、麥粉、和牛油。』

然後跟着就是一頓謾罵。

我一定得要告訴這封『覆信』的作者和他底同事們，我老早就開始收到和他的一樣可憐的簡，而且是常常地收到。起先都是些『黑社』的團員們，常寫些正如這塊野蠻的信給我，用種種

可怕的事體威嚇我，其可笑正如現在這些人對我所用的，而這些人們，我想，在十五年以至二十年前曾是與行兇百人團以及反動勢力，圖的一切事物底坦白的敵人。他們寫的這種東西那時即不能阻止我的工作，現在也不能，終久依然不能。我如同一個善於捉鳥的人，單那鳥的音調，用不着眼睛去看，就能說出那是一隻什麼鳥。同時，舉個例子講，我也知道像彼得一世的那種『改良主義』，是永久爲那些在舊秩序下感受到生命是甜蜜的人們所唾棄的。

但是今天在蘇聯活動着的並不是彼得一世，而是伊凡大帝——共披一件外衣的工農；而且今日之事，無關『改良』，而是整個舊生活基礎的一個根本改換。因之，那些愛好舒適的過去的人，誹謗和咒罵那個不倦地領導着整個勞動羣衆走向一個新生的工農政府，便完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我知道在過去以及現在，俄國有着很多壞的事情；我有理由相信，關於這些事情，我比這些匿名信的作者們知道得更清楚。但是好的東西從沒有比今天在俄國所存在的更好。而壞的東西從沒有在蘇俄那樣無情地暴露出來，像在蘇俄那樣奮勇地被攻擊。

這些匿名信的作者們像 Gatsialitcheskyy Vestnik 的丹先生（原註 11）一樣，想要知道我的甚麼現在不重複我曾在 1917 年說過的話。我的回答是：在 1917 年我是錯了的，我那時

新報

真地害怕無產階級獨裁會把受過政治訓練的布爾希維克工人們導入消散與毀滅之途，而他們是僅有的真正的革命力量；同時我又怕他們的毀滅結果會造成社會革命必像日蝕那樣受到長期蒙蔽的一種觀念，但那個時候，若干知識份子也發覺他們之相信自己是一個革命的力量，是會被人誤解的。從那時起，又過了十年。在這時期內的俄國，一堆多得令人驚異的工作已在勞動和創造力的領域中被完成了，雖然這些工作曾被『文明的』歐洲用各種方法加以阻撓，且現在還被阻撓着；歐洲的資產階級受到俄國逃亡者的狂熱鼓勵，這些逃亡者以前是錯誤了，現在却正爲他們的錯誤，以及他們對於自己的卑微之自覺等所激怒，惹起大家對於他們的厭惡。我並不詔媚工農政權；我却誠摯地崇拜它的工作，以及它的能力使人們去工作，使人們參加創造的活動。你們對於我之崇敬它，很覺得不高興嗎？倘若如此，那便很奇怪了。固然，我不會反抗你們如此狂熱地加在我身上的可鄙的謾罵和恐嚇，謾言和惡毒，正是因爲你們『捨此別無他事可做了』。我知道這謾罵的自由是你們的箴言和娛樂。你們如果不能扯謊，那麼你們還有甚麼可幹呢？

丹先生說過，在我的慶賀工農政府演詞刊在英國報紙以前，『我認爲先要求得政府當局的許可，乃是正當的手續。』凡是稍稍知禮或自尊的人，誰都不會寫出如此粗俗的東西；可是丹先生竟是這樣的做了。

其次，丹先生和這位匿名者一致得很奇怪，狂呼着反對工農政府的「野蠻」。他顯然忘了最近的過去許多事情；對工人整批的槍殺，「利那事件」(Lena affair) 一九〇三年和一九〇五年正月九日對猶太人的殘殺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阿默卡車路 (Amur Carl Road) 千萬人的充軍，可憎的一九一四——一八的戰爭，最後，還有白軍將領們得到某些俄國「革命黨人」及「羣」高等知識份子的大度的援助在俄國所做的一切。顯然地，丹先生並不懂得下面的一切：人民過去遭受無數的苦難，爲了要報復，自要發生野蠻的行動；人民的自衛的痛苦，人民被一些露面的和隱匿的奸細以及不可協諒的敵人所包圍，爲了自衛，也不得不有一種殘酷的行動。這種殘酷是被動地引起，所以是正當的。

但是此外還有寄生者們的殘酷，他們慣於依靠被奴使的人們而生活，而且他們正再度去奴使那已獲得自由的人們。這種殘酷是不能認爲正當的。

自然，我向丹先生提醒這樁事，並不是爲了爭辯，而是給他一個啓迪。

原註：在國外發行的反革命的俄文報。

英譯者。

原註：白俄，希維克領袖。

英譯者。

此為代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